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探析

白宸其

暨南大学，广东省广州市，510632；

摘要：《数字政府建设指导意见》提出的“服务下沉、数据上云”原则，为破解基层治理资源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分析，智能监控系统与网格化管理平台的协同应用正逐步构建起虚实交融的新型治理空间。该技术嵌入延续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又创造出线上线下的多维互动渠道。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要义，并提出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关键词：数字技术；基层治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DOI：10.64216/3104-9702.25.04.021

当前基层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环境快速变化与民众诉求多样化带来的多重挑战，传统治理模式在应对新型社会问题时逐渐显现出能力与效率方面的局限。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为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但单纯依赖技术本身难以形成持久有效的治理机制。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具有科学指导性的理论工具，能够为解决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根本矛盾提供分析框架。

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要义

1.1 实践唯物主义视角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哲学观点阐明了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随着物质生产方式演进而创新，数字技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新型手段，本质上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原理。然而，技术工具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不应停留于表层操作，而应深入生产关系调适领域，在物质生活资料再生产层面重构治理体系^[1]。

1.2 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传统治理体系下的信息壁垒与科层制管理模式已经难以匹配信息化社会的动态发展需求，新兴技术手段的介入重构了基层主体间的联系网络，为治理要素的有机整合创造了物质基础。此外，技术工具所具备的双向传输特性和跨时空连接能力突破了传统治理活动的物理限制，使资源调配和公共决策的运作更加高效^[2]。

1.3 矛盾分析法应用

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存在着碎片化、模糊化、内卷

化等现象，在传统手段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推动资源整合、实现权力整合、有效实现功能替代和优化治理的显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其内部矛盾运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治理模式的融合过程正是各类矛盾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当前基层治理体系在技术应用层面存在主客体关系调整、运行机制创新与既有制度框架协调等问题，这些矛盾能够推动治理效能的提升^[3]。

2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2.1 坚持“人民立场”为核心，锚定数字治理价值导向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不等同于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简单的数字化，而是将数字技术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通过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其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来。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域下，数字化时代的基层治理变革应当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将群众根本利益置于数字化建设的基础性地位。

基层部门可搭建智慧社区云平台，将政务服务、民生诉求和公共决策三大模块进行有机整合。通过居民行为数据的系统分析，基层干部能够准确识别老年群体在居家照护、慢性病管理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同时，社区医疗资源的智能调度系统可以根据实时就诊数据动态调整家庭医生的服务半径，使得行动不便的居民能够获得及时的健康管理支持。而居民在平台上的每一次建议提交都会触发对应部门的回应流程，该即时互动机制打破了传统治理中信息传递的层级壁垒。此类技术架构的

设计逻辑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观点的当代诠释,其内核是确保数字化改革成果真正转化为民生福祉^[4]。

然而,数字技术在优化治理效能的同时也为群众参与基层事务开辟了新路径。部分地区的政务服务APP设置有政策评议模块,居民不仅能查询办事指南,还可以对即将出台的社区规划草案进行讨论。当超过特定比例的住户对垃圾分类方案提出优化建议时,系统会触发自动预警并启动修订程序。该双向互动机制的有效运作能够提高决策的民主化水平,增强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认同感。

需要警惕的是,数字治理实践中可能潜藏着异化风险。某些地区在推进网格化管理时曾片面追求数字化覆盖率,过度依赖智能设备采集信息,导致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被标准化数据所遮蔽。该倾向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为此,基层部门可推行移动端“人工+智能”双轨运行机制,工作者定期带着智能终端走访困难家庭,在保持技术效率的同时坚守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

2.2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平衡技术工具性与治理本质

技术手段的革新带来了效率提升与资源整合能力的飞跃,但脱离了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关注便会偏离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当前部分地区在数字治理实践中已意识到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有机融合的重要性,尝试在效率最大化与服务人性化之间寻求动态平衡^[5]。

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为例,基层部门可引入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居民报修、投诉等事务线上处理,大幅缩短问题响应周期。平台整合了社区人口结构数据后自动生成特殊群体服务档案,尤其针对辖区内老年住户占比高的现实情况,同步保留传统人工服务窗口并组建银龄志愿服务队伍。同时,该模式借助算法分析预判设施维护需求,避免技术崇拜导致的“数据空转”,也为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保留了线下沟通路径。在日常管理中,网格员需定期入户走访核实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及时补充无法被技术识别的个性化诉求。部分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存在日常代购药品等特殊需求,虽然不属于平台预设服务范畴,但工作人员将这些“数字鸿沟”转化为完善服务体系的契机,建立起服务清单动态补充机制,使技术系统与人工服务形成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此类实践探索的价值在于揭示了技术与人文的辩证统一关系。智慧平台的运行为基层工作者节省了重复性劳动时间,但服务温度始终依赖于对群众生活实况的体察能力。当系统推送出某片区水管维修频率异常升高时,管理人员结合实地走访发现是老年住户对智能水表操作不当所致,这促使他们调整工作策略,在推进设备更新的同时安排志愿者开展操作培训。整个过程没有否定技术监测的重要作用,也没有陷入技术至上的思维窠臼,而是将工具理性转化为实现治理目标的路径而非终点^[6]。

此外,实践中辩证思维的贯彻还需打破技术赋能的单维度认知。当街道试点推行全流程线上办公时,初期的审批效率提升却伴随着老年群体办事障碍的增加。工作人员需及时修正实施方案,保留必要的纸质材料提交渠道并创新推行“双轨并行”的服务模式,使不同群体能自主选择办事方式。该调整看似与技术推广方向相悖,实则深化了对治理现代化内涵的理解。系统后台收集的群众选择数据成为优化服务的重要参考,促使技术更新更贴合实际需求。

2.3 依托“系统观念”,构建全域协同的数字治理体系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横亘在政府、民众、社会组织等主体之间的阻碍,实现了社会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协同的转变,将传统的权力行使由单向度变为上下互动协商,调动了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优化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数字技术融入基层治理实践,关键在于把握全局思维与整体布局间的内在统一。以系统观为指导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治理模式中条块分割的局限,将分散在社区管理、公共服务、风险防控等领域的资源要素纳入统一框架^[7]。

社会治理存在地域差异,不同的地区面对的实际问题各有不同,在选择发展目标和对策的时候应该因地制宜。例如,在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基层组织可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公安、民政、城管等十余个部门的信息资源,使得原本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公共事务能够在统一界面进行流转处置。在具体运作层面,系统观念指导下的治理架构需要关注数字技术与现实场景的深度适配。部分地区将网格化管理与数字技术相融合,在原有物理网格基础上构建虚拟信息网格。管理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实时采集辖区内的民生

诉求与环境问题,系统根据事项性质自动匹配处理部门并启动响应程序。此种双向反馈机制能够保持网格治理的在地化优势,通过智能分拨提升了处置效率,特别是面对道路破损、垃圾堆放等常见问题时,平均响应时间从过往数日缩短至实时处理。

此外,治理体系的系统化转型还需注重制度保障与能力建设的协同推进。有些地方在搭建数字化平台的同时制定了跨部门协作规程与数据使用规范,明确不同层级在处理城市管理、应急响应等事务中的权责边界。例如,在整合多部门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基层组织可开发重点区域风险预警模型,当水位监测、地质勘查等不同来源数据出现异常关联时,系统自动生成综合研判报告供决策参考。此类将分散风险要素进行立体化关联分析的方法,本质上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风险感知能力的系统性提升^[8]。

2.4 遵循“实践第一”原则,推动数字治理动态优化

马克思哲学认为实际行动比单纯认知更具现实意义,解决问题的根本动力来自现实操作。该思维模式对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启发作用,注重实践经验积累和策略优化的思维方式,为解决数字技术应用与治理效率不匹配问题开拓了思路。

基层管理部门在试运行网格化智慧治理模式时,最初配备多种智能设备和网络平台开展日常巡查与数据汇总。实际使用中发现,单纯依靠技术设备难以有效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群众遇到邻里纠纷时仍习惯直接前往社区办公室反映情况。为改善这种局面,管理方将原有单向信息收集系统升级改造为双向沟通平台,在应用程序首页位置添加便于操作的问题反馈窗口,普通住户使用手机便能直接上报生活环境治理需求。考虑到部分老年人对智能终端存在使用困难,各社区开辟线下指导专区,安排网格员每周固定时间为高龄居民讲解如何利用语音功能快速传递诉求信息,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应用鸿沟^[9]。

数字治理的动态完善过程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当代治理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当城市试点推行“智能信访分析系统”时,最初设计的算法模型主要依赖历史信访数据训练,但实际应用中难以识别新型社会矛盾。通过定期组织信访干部与算法工程师联合分

析案例,系统逐步建立起结合政策法规与社会热点的动态研判机制,将12345热线中的情感词频分析结果作为研判辅助指标,使自动分流的准确率得以提升。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推动了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层次变革,这种变革本质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技术时代的实践样态。基层组织可通过坚持“人民立场”为核心锚定数字治理价值导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平衡技术工具性与治理本质、依托“系统观念”构建全域协同的数字治理体系、遵循“实践第一”原则推动数字治理动态优化等方式为创造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基层治理生态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刘颖,张宜军.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价值、困境及突破[J].沈阳干部学刊,2025,27(05):25-29.
- [2]王学文.从“数字赋能”到“治理增效”: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J].中国电子商情,2025,31(18):127-129.
- [3]罗理章,许赢盈.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建的耦合机理、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8(05):1-11.
- [4]沈旭情.数智时代下基层技术治理风险及其路径优化研究[J].公关世界,2025,(14):115-117.
- [5]陈肖东,张彤.数字技术优化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途径探析[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5,37(04):68-74.
- [6]尹佳慧.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数字治理“悬浮化”的生成与消解[J].智慧农业导刊,2025,5(13):6-9.
- [7]刘超,夏湘玉.基层数字治理平台的效能悖论:现实表征、生成机理与纾解策略[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6(04):53-63.
- [8]陈瑶.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与现实之思[J].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2):74-80.
- [9]章敏敏.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然逻辑、制约症结与纾解路径[J].学术界,2025,(06):66-75.

作者信息:白宸冀,女(2000.11),汉族,籍贯吉林白城,硕士生在读。